

2013 年 3 月
第 1 期八 桂 侨 刊
Overseas Chinese Journal of BaguiMar.2013
No.1

封面学者

李国梁教授访谈录

郑一省 张龙腾

[中图分类号] D634

[文献标识码] D

[文章编号] 1002-3925(2013)01-0003-04

李国梁教授,一位潜心研究华侨华人经济的学者。1942 年生于湖北随州。1965 年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65 年至 1991 年他先后任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现为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92 年起任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在行政方面,他于 1984 年至 1990 年任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副所长,1990 年至 1997 年任厦门大学科研处副处长。1984 年任日本长崎大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95 年任名古屋经济部客座研究员,1996 年任东京亚洲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现任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常务理事、福建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以及中国太平洋学会理事等。

采访者:李老师,您好!您一生都致力于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史的研究,您的执着让我们感动。可否谈谈为什么选择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史作为您的主要研究方向吗?

李国梁:华侨华人经济的研究其实是一个偏题,因为资料很难获取。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将华侨华人经济的数据跟当地其他的资本(比如当地民族资本、外国资本)完全区分开来,这需要懂华侨华人研究的学者来区分。虽然大家都讲华侨华人经济的研究很重要,但真正静下心来去做华侨华人经济的学者不多,主要还是因为搜集资料太困难。我的研究兴趣集中在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史这一领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东南亚华侨华人数占全世界华侨华人数总量的 70%~80%,到现在还是这个数据。因此,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第二,东南亚华侨华人历史悠久,与当地的融合程度较好,所以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是与当地经济融为一体的,这就很难区分华侨华人经济和当地经济。研究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对研究华侨华人的贡献非常有帮助。华侨华人对当地的贡献,最突出的无非就是华侨华人的经济贡献。当然,在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反帝斗争等方面华侨华人都有贡献,但对当地社会起长期作用和根本作用的则是华侨华人帮助当地发展民族经济。无论是在种植时代,还是之后的独立的民族经济时代,华侨华人通常都是先做替代进口,然后发展到出口导向经济,在整个过程中,华侨华人对当地的经济贡献都非常大。我们所讲的“华侨华人经济”不是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经济体系,而是指华侨华人的经济活动。“经济”这个词有多种解释,它可以指经济体系,也可以是经济制度,还可以是经济活动,而我主要是研究华侨华人的经济活动。

[收稿日期] 2013-03-07

[作者简介] 郑一省(1959-)男,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华侨华人、东南亚民族与国际关系;张龙腾(1987-)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2009 级人类学硕士生。研究方向:华侨华人。

第三,东南亚排华最为剧烈。欧洲、澳洲虽有排华,但都是阶段性的。现在欧美国家已经采取多元文化政策,而在东南亚,1998年的印尼仍在大规模排华。因此,它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今后谁也不能保证华人在东南亚就能稳稳当当地生存下去。那么,这个排华根源在哪里呢?有多种说法:有人说排华的诱因是偶然事件,因为当地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激化,统治阶级就制造事件,把矛盾指向华人,引起当地人对华人的愤怒,然后就进行排华;有人说是华人自己不够检点,他们铺张浪费,喜欢炫耀,这便引起当地人的不满。但根源是当地政府或者当地民间对华人经济有看法,这在东南亚非常明显。他们认为二战以前华人经济是殖民主义经济的帮凶,殖民者将商品从国外运到东南亚,华侨华人将这些海外商品贩卖给当地人。同时,华侨华人又将当地老百姓的资源集中收购,以中间商的身份将这些资源转售给殖民者公司。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时期,殖民者经济从东南亚大量撤走,当地政府又认为华侨华人经济是殖民经济的残余。再加上当地以农业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欠发达,而华侨华人经商者居多,相对来讲,华侨华人经济地位普遍比当地人较高。这就给当地人造成一个印象,即“华人是移民过来的,但是比我们当地人生活更好,你们华人剥削了我们”。华侨华人剥削当地人的这个论调在东南亚很流行,有这样一个思想基础,所以一碰到风吹草动,当地政府和百姓就很容易迁怒到华侨华人,华侨华人便成了替罪羊。

因此,从理论上、从历史事实上、从华侨华人经济发展史上,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很重要。即华侨华人是否真正剥削了当地人,然后发财致富了,或者华侨华人经济是和当地经济融为一体。事实上,华侨华人内部也是有阶级之分的,华侨华人经济也呈金字塔形状。最富有的是工厂企业老板,大量的华侨华人还是处于中下层的。此外,华侨华人在办厂或者搞种植业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比较封闭的经济。他们主要是雇用华侨华人劳工,虽有雇佣少量当地人,也不能表明他们剥削当地人,因为华侨华人劳动者大量存在。实际上在西方殖民统治时期,就有西方学者做这方面的研究,比如凯特在1936年写的《荷属东印度华人的经济地位》,描述了大量的华侨工人都是金矿工人、锡矿工人、种植烟草的劳工等等。

第四,中国移民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和中国的关系密切。中国文化在海外社会里虽有变化,但总体来说以传承为主。大量的华人社团、华文报刊、华文学校等等都是维系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纽带。相对其他国家的移民而言,比如印度移民与印度的关系、欧美移民与欧美的关系,华侨华人与中国的联系更多,其中一种联系就是经济上的联系。经济联系曾被西方殖民者拿来作文章,他们说华侨华人赚的钱都用于建设他们自己的国家,从而导致当地人的贫穷,这个问题也是需要研究的。

根据林金枝等学者的研究,以20世纪50年代人民币币值来算,华侨华人于1868年至1949年对中国的投资总共才7亿多人民币,而当时的侨汇有30多亿,可见华侨华人寄回国内的钱主要是用于资助家属,而非投资国内建设。改革开放后,华侨华人与中国的联系增多,相当一部分华人来中国投资,其中包括大量的“大华人”经济集团。这需要对“大华人”经济集团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做一个定位性的研究。一个定位就是中国意识、中国情结是否是“大华人”投资的主要动力。这是很关键的问题,很多干部对此很模糊,认为华人爱国爱家,回来投资,而国外认为是中国强大了,海外华人便重新返华,这些都是违反事实的说法。

华人回来投资主要是利益所趋,这是在当今国际化背景下投资效益选择的一个基本模式,即哪里的劳动力便宜,哪里的管理相对方便,企业家就到哪里投资。况且华人与中国容易沟通,中国对华人企业也有优惠政策,追求利润是东南亚华人来华投资的主要原因。比如泰国的正大集团主要靠中国赚取利润,经济危机的时候它在其他国家的利润跌得厉害,而在中国的利润却只增不减,后来正大的总部搬迁到上海,如果没有利润,也许它早搬走了,比如搬到越南、柬埔寨等劳动力更廉价的国家。这是一个国际化背景下资本流动的规律,种族的界限和国界越来越模糊,唯有利润这个动力在起作用。不可否认,某种乡情、或者中华情结的确存在,但并非主要动因。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慈善事业,但华侨华人在当地做的慈善事业更多。

另外,根据我的研究,1992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投资者很多,东南亚华人是来华投资的排头兵。东南亚华人财团众多,但是根据我在1996年的研究,世界华商前500家只有1/3华商来华投资,而他们也主要是受利润所趋。所以我们要客观地看待这个现象,华人的投资主要还是集中在当地社会。战后华侨华人社会变化明显,现在回来投资与他们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投资性质不一样。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

机的时候,就有华人来华投资,比如厦门华人黄奕住当时把当地资本连根拔起回国投资,当时他是华侨身份,按照20世纪50年代的说法,那时的华侨与国内联系最紧密的。战后华侨社会转变为华人社会,他们只是利用部分资本到中国投资,而主要资本是在国际上或者侨居国内流动,投资也集中在当地。比如印尼华人林绍良的主要资本是在印尼,谢国民起家的资本也是在泰国,菲律宾华人陈永裁虽然曾回福建投资,但他更多的是投资当地。华人的主要资本在当地,这些问题都要说清楚。

我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思考,参考了国际上的相关说法。国际上关于华侨华人经济的观点主要分为三大派。第一种观点是华侨华人经济是外来经济,这主要是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初的观点;第二种观点是华侨华人经济与当地经济既有区别也有融合;第三种观点是华侨华人经济是当地民族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是我的观点。我的观点主要是受日本学界的影响。日本学者较早研究华侨华人经济,他们很多对华侨华人经济的研究都比较客观,比如游仲勋、涂照彦等,我跟这些学者接触很多。1984年日本学者邀请中国学者去日本进行学术交流,我便报了“日本的华侨华人经济研究的现状和不同学派”这个题目去了日本。当时我几乎拜访了每个研究华人经济的日本学者,互相交流学术。因此,我的研究吸收了大量的日文材料,通过日文资料,我又间接吸收了部分英文资料,因为日文资料中有大量前沿的西方资料。1993年,我拿到国家社科基金“东南亚华人资本的历史考察”,1996年我完成了课题并出版《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后来我就研究华人对中国的投资。退休前,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史一直是我的主攻方向。

采访者:李老师,您能否谈谈目前国内对华侨华人经济研究的现状,以及其所存在的问题。

李国梁:本人认为,目前国内对华侨华人经济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发展:

首先,学术界比较注重对海外华人基本经济状况的资料的搜集。这种搜集不是只针对某一国家而言,而是对整体的资料搜集。在这方面曾有几个较大的课题在运作,比如龙登高等人的课题,国务院侨办也设立专门的课题组进行这种资料的搜集。在资料的搜集方面的确有进展,但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我并不看好它的效果。我个人历来认为华侨华人的研究有两大难题:第一是人口数据,华侨华人到底有多少人,因为这牵涉到华人代数,没有一个定论;第二是华侨华人有多少钱,他们的经济资本很难估算。这是两大难题,有人敢于承担这方面的研究,不管结果怎样,敢于研究还是值得鼓励的。

其次,对海外华人来中国投资情况的研究有不少进展。包括华人企业的管理、对当地经济的带动、甚至对省、县经济的贡献等等,关于这些方面研究的材料也越来越多。

尽管目前国内对华侨华人经济的研究有一定的发展,但依然存在某些严重的问题:

第一,国内对华侨华人经济的研究存在断层现象,老一批专家逐渐淡去后,中间有些空挡。比如在1990年代中期,关于华侨企业集团的研究很热门,这为华侨华人经济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后来一批教授相继退休,很少有人继续研究,因为资料的搜集的确困难。现在蔡仁龙教授还在坚持研究印尼华侨华人经济,因为他有丰富的资料。当然这个也不能全怪研究者本身,华侨华人经济的研究本身就有很大的难度。

第二,对华侨华人经济史的研究很少,尤其缺乏经济史的国别专家。经济史的研究需要大量的史料,因此研究者需具备某些基本条件,比如需要有较高的外语水平,仅仅依靠中文材料进行研究是不够的,因为这种经济史的研究也有国别之分,笼统研究是没有效果的。因此华侨华人经济史的研究需要造就大量的国别专家,不同国别专家通晓不同国家语言。比如研究印度支那的华侨华人经济,学者要精通法文,研究早期菲律宾华侨华人经济史,学者要懂西班牙文,而研究菲律宾后期的华侨华人经济史需掌握英文。

第三,我现在深切地感受到华侨华人的研究角度很广,几乎任何学科都已渗透进来,比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甚至包括地理学、语言学、法学、戏剧、文学等。现在各个学科都在深入研究华侨华人,这是一个好事,华侨华人是一个群体,必须要从多学科来研究,但问题是很多研究者并没有坚守阵地,关于华侨华人经济的研究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各学科的研究者需要像蔡仁龙教授研究印尼经济一样,抓住印尼华人财团这个点不放。又如日本人研究东南亚华人经济,一般在东南亚待很多年,所以他们的材料非常丰富。要深入研究华侨华人经济,研究者需要在国别和领域上坚守阵地。科学研究是打井不是挖井,是长跑而非短跑,只要抓住华侨华人经济领域某一点,坚持研究,即使很难,也可以起到填补空白或者奠基

作用,现在学术界就是缺少这种人才。我们这代人毕竟老了,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将下面的梯队培养好,我带了很多研究生,他们都做过华侨华人经济方面的研究,但因为现实的问题,毕业后他们都放弃了。人各有志,这个我并没意见,但从研究者的角度,我总希望高校或者研究所有稳定的研究队伍。

第四,有关华侨华人经济方面的很多资料有待挖掘。我认为这是一个人的问题以及研究兴趣的问题,学者进行这种研究是需要坐冷板凳的。比如日本长崎曾发现某金门陈姓在清末到民国时期开的一个商号,光这些资料就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博士。

第五,我国对华侨华人经济的研究相对滞后,也很肤浅。国际上特别是日本对华侨华人经济的研究非常深入、细致。比如他们研究泰国的华人财团,就编纂了一本关于泰国 12 个华人财团的专著,资料非常详细。国内与日本学界有很大的差距,他们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值得我们学习。现在华侨华人研究的课题范围非常宽泛,主要是为侨务政策服务。另外,政府的态度对华侨华人经济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影响,他们一般对华侨华人经济数据感兴趣,却不重视华人经济理论等基础研究,比如华人经济的发展阶段,对当地的作用等等。

【海外侨情资料】

多米尼加“中国城” 美洲最年轻的唐人街

位于多米尼加共和国首都圣多明各市老城区的全球第八大唐人街(中国城)。与美国旧金山、洛杉矶、纽约和古巴哈瓦那的唐人街相比,圣多明各的唐人街可说是美洲最年轻的唐人街。

2006 年初,圣多明各唐人街在时任多米尼加爱国侨社“鲜花基金会”侨领吴玫瑰(Rosa Ng)女士的倡议下,破土动工。在当地华裔社会、圣多明各市政府和多米尼加政府有关部门的积极支持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在 2008 年 4 月 17 日正式落成。

圣多明各唐人街位于旧城北边,这里原本有一些华人商铺,经过大面积改造,现已成为拥有 4 个街区、两个广场,数百家商铺的商业旅游区,总面积有 4 万多平方米。主要街道是杜阿尔特街,长 200 多米,街的南北两头分别竖有两个牌坊,南头牌坊上刻着“四海为家”,北头牌坊上面刻着“天下为公”,两个牌坊分别来自祖国大陆和台湾。街道两边华人店铺和商场鳞次栉比,商品琳琅满目。目前这里已经有 7 家超市,多家华人餐馆、旅馆和旅行社。华人超市和商店出售各种日用百货、家具、蔬菜水果、鸡鸭鱼肉、食品茶叶等,应有尽有,一应俱全,连香炉都能买到!这里还有当地罕见的商品,如产自广东、福建的龙眼、荔枝,中国人日常吃的小白菜、芦笋,甚至还有糯米鸡!市面非常活跃。中国城带旺了这一片的经济,每到周末周日和节假日,中餐馆

都是高朋满座。这里所有店铺的店招都是中西两种文字并用,非常显眼,让人一望便知。

唐人街的两个广场位于东西两侧,一个是孔子广场,另一个是十二生肖广场。孔子广场栽有竹子,广场尽头是一面墙,孔子塑像竖立在中间。塑像的下方用中西两种文字刻有孔子《礼运·大同篇》节录:“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十二生肖广场,有大理石雕刻的十二生肖塑像和观音菩萨塑像,栩栩如生。此外,在唐人街各个街道两侧还置放着不少中国名人的雕像,这不仅可让多米尼加的华侨和华人有文化上的认同感,还可让更多的当地居民去认识中国的文化和历史。

当地华人说,圣多明各唐人街是老华侨的温床、新华侨的聚会所。每到端午、中秋、春节等中国传统的节日,当地华侨和华人便活跃在唐人街上,舞狮舞龙,举行中国传统的武术表演,也可看到华人烧香点烛拜祖宗、祭神灵,祈求幸福与吉祥,还可以品尝到地道的中国年夜饭、年糕和粽子。此外,还会放鞭炮,在爆竹声中除旧岁。(徐世澄)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 年 01 月 09 日第 06 版)